

欲速则不达

如何应对潜在增长率的降低

蔡 昉

一、引言

在中国迄今为止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征，抑制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率转变成投资率，生产要素供给得以充分满足；劳动力大规模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微观激励机制的改善带来技术效率的提高；通过学习过程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巨大的技术差距可以转化为自身的技术进步。因此，在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的条件下，过去 30 余年中国享受了极高的潜在增长率，并实现了大体相同水平的实际经济增长率。

然而，随着 15 ~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并预期在 2013 年停止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中国经济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逐渐减弱，越来越受到新古典增长条件的约束，即出现劳动力短缺及其导致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的窗口缩小，未来的经济增长既受到投入要素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潜力也会减小，因而潜在增长率必然相应下降。

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条件下，政策面临诸多选择。是不遗余力地试图实现一个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还是任由潜在增长率决定未来的增长速

度，或者做出努力以合理改变潜在增长率，要求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手段，进而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经济增长后果。

我们以图 1 说明应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各种政策选择及其可能的结果。在当前的长期总供给曲线 S_1 条件下，实现更高的产出意味着更高的总成本。例如，当产出水平从 O_0 扩大到 O_1 的情况下，总成本从 C_0 大幅度升高到 C_2 。而且，如果扩展这个总成本概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指与投入产出相关的物质成本呈现显著的递增趋势，实际上还包括在宏观经济稳定性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意义上的成本，如高通货膨胀率、资源和环境代价，甚至包括追求高速度的政策所造成的损害，如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产能过剩等等。可见，追求高于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是危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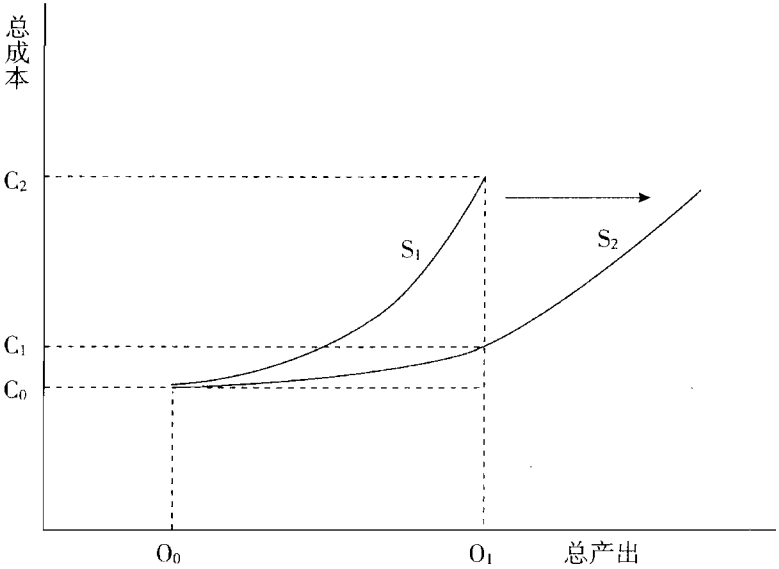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长期总供给曲线下的增长代价

一个在分析中常见的错误，或者经常会造成政策误导的倾向，是把经济增长需求方因素与供给方因素混为一谈。当我们谈到潜在增长率时，需求方的因素只是影响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即增长率缺口。短期强劲的需求可以把实际增长推到潜在增长能力之上，孱弱的需求可以造成实际增长达不到潜在增长能力，但是，决定经济增长可能性的，归根结底是受到要素供给和生产率因素制约的潜在增长率。因此，在潜在增长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为制造需求的扩大，以为是某种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能助长实际经济增长超越

潜在增长率的倾向，同样会造成扭曲的结果。

但是，潜在增长率却是可以改变的。例如，在价格刺激增大和体制环境改善的条件下，相关生产要素的供给可以增加。此外，激励机制的改善也具有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如果长期总供给曲线从图中的 S_1 扩展为 S_2 ，同样的总产出增长（从 O_0 扩大到 O_1 ）可以在小得多的总成本（仅仅从 C_0 上升到 C_1 ）基础上实现。换句话说，改变了潜在增长率既可以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不会造成扭曲和对宏观经济的损害。

本文将引用若干关于潜在增长率的估计结果，说明其降低的必然性。我们还将论证，追求一种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必然要采取扭曲性政策手段，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剧经济增长中的不平衡，妨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国际经验，这样做的结果，就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愿望来说，必然是欲速则不达。同时，我们将揭示，潜在增长率并非不可以改变。通过必要的制度建设和公共政策，可以从生产要素供给、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等诸多方面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支撑更高的实际增长率。

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影响 GDP 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及其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要素供给特征及生产率的源泉是不尽相同的。在 1978 年至今的整个时期中，2004 年以前中国处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2004 年以后则处在从二元经济发展到新古典增长的转变阶段。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资本报酬递减这一典型的新古典现象并不明显，因此，经济增长可以在要素积累的条件下得以维持，而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移可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生产率改善的基础。因此，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上述条件就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就势所必然。

作为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对剩余劳动力吸收速度的结果，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但是，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终究会在某一时刻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方式突出表现出来，即所谓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2004 年最符合刘易斯转折点的上述标志性表现。对中国来说，继 2004 年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另外一个转折点即以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以及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点，到

来得格外早。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经过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大约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 (Minami, 1968)。如果以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的年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日本到达这个转折点的时间为 1990 年，两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之间相隔 30 年左右。韩国学者的研究则表明，韩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经过刘易斯转折点 (Bai, 1982)，而以人口抚养比提高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点则要在 2013 年前后达到，其间相隔约 40 余年。如果以 2004 年作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2013 年人口抚养比提高的年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点，其间仅仅相隔 9 年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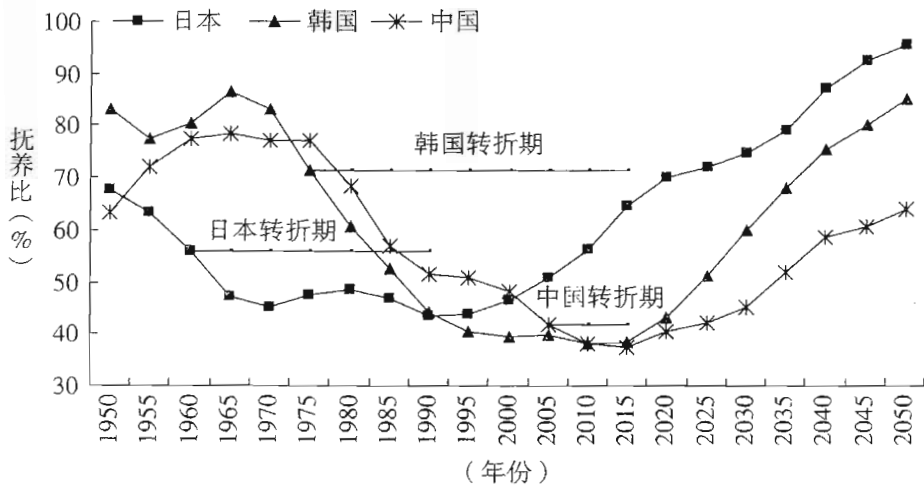


图 2 中、日、韩三国转折期比较

资料来源: UN (2009)。

按照人们通常使用的数据来源看，仅就人口红利消失及其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这一点来说，以人口抚养比已经降到最低点，预期很快就显著提高为特征，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与日本的 1970 年以及 1990 年都具有相似之处：1970 年，日本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但是，在这个低点水平上一直保持到 1990 年，自那之后，人口抚养比才迅速提高。与此相应，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大幅度降低 (池田信夫，2012，第 6 页)。此后，无论其实际增长率是超过还是达不到潜在增长率，相应地形成或正或负的产出缺口，终究只能围绕潜在增长率浮动 (Amornthum, 2002)。事实上，日本的实际 GDP 增长率从 1950 ~ 1970 年期间的年均为 9.2%，大幅度降低为 1970 ~ 1990 年期间的 3.8%，并进而陷入 1990 ~ 2010 年期间 0.85% 的停滞状态。

基于增长核算方法，许多研究者对 1978 ~ 2009 年中国潜在 GDP 增长率进行了估计，并对 2010 ~ 2020 年情景进行了预测^①，得到比较类似的结果。例如，高路易 (Kuijs, 2009) 的估计结果是：中国在 1978 ~ 1994 年期间的平均潜在 GDP 增长率为 9.9%；1995 ~ 2009 年期间为 9.6%；2010 ~ 2015 年平均为 8.4%，2016 ~ 2020 年平均为 7.0%。陆旸 (2012) 的估计结果则更悲观一些，即中国的平均潜在 GDP 年均增长率，在 1978 ~ 1994 年期间为 10.39%，1995 ~ 2009 年期间为 9.76%。但是，在“十二五”时期将下降到 7.79%，在“十三五”时期进一步降低到 6.31%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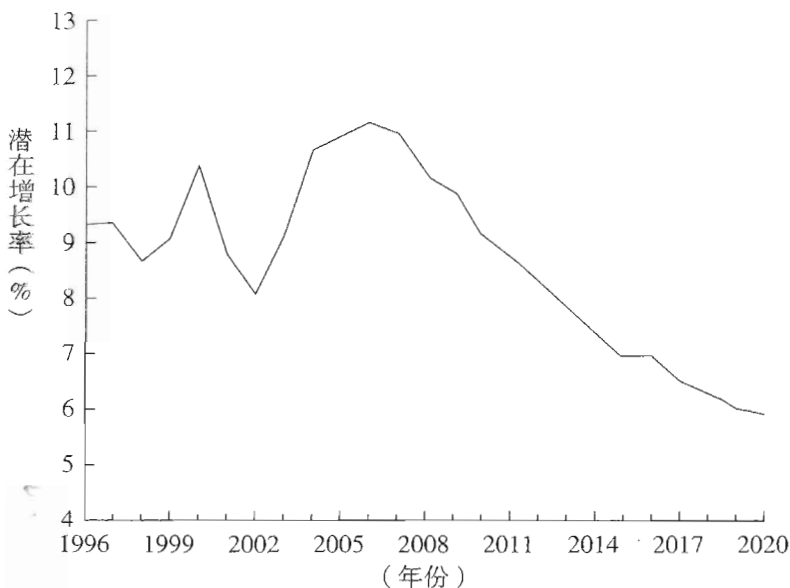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 GDP 潜在增长率预测

资料来源：陆旸 (2012)。

由于中国人口转变的变化速度，实际上大大超过了以往的预测，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上述预测仍然可能高估了中国 GDP 的潜在增长率。根据一直以来的预测，中国 15 ~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于 2013 年停止增长并随后绝对减少，人口抚养比的逆转也发生在同一年。而最新的数据显示，由于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②，

^① 估算过程及其数据和方法的细节，请参见陆旸 (2012) 以及 Kuijs (2009)。

^② 大部分学者和联合国官方报告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 1.4 ~ 1.5。然而，有人分析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得出，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 1.18。参见穆光宗 (2012)。

中国 15 ~ 59 岁年龄人口已于 2010 年开始绝对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2，第 10 章）。因此，劳动力供给的制约要比预测中设想的情形严重得多。

与此相应，大多数预测也难以准确地评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严重程度，从而高估了资本供给的潜力。更重要的是，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幅度减少，不再可能像以往那样轻易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逐步缩小，也使得未来增长的后发优势式微，技术进步难度无疑加大。这都会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显著减速。

三、追求高速度的代价

如果中央调控者不情愿接受降低了的潜在增长率，则需要借助“抓手”，施加外力或市场力量之外的刺激因素，以争取获得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更高增长速度。此类政策可以表现为旨在探寻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扶持政策、以维持高速增长速度为目标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及着眼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区域发展战略。那么，对潜在增长率的这种偏离有什么问题吗？无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中国经济已经存在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现实看，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很显然是有问题的。

首先是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在频繁的调控中伤害中小企业的成长环境。用刺激性政策手段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高速度，不可避免给宏观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也加重了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除了潜在的日本式的泡沫经济危机之外，实施刺激性政策之后，在担心通货膨胀及其预期攀升，从而出台紧缩性政策的情况下，撇开国有大型企业和国家级投资项目往往会受到例外的保护，而让中小企业成为调控重点不说，即使没有这种先验式的政策歧视，调控过程本身也必然造成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例如，在收紧货币供给的政策要求下，一方面依靠提高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等手段抑制贷款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所谓“窗口指导”直接控制贷款规模。这时，宏观调控常常强调一个原则，叫做“有保有压”，初衷是保护那些健康和具有连续性的投资项目，压抑那些可能导致产能过剩的项目。但是，在基层商业银行的直接操作中，则出于贷款的安全性、可控性等目的，把“有保有压”执行成为保大企业、大项目，压中小企业和民营项目。因为前者有政府的担保，有免于风险的软预算约束从而还款能力，而后者只能依靠竞争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遭遇的紧缩程度一定大于大型企业。

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生产率的提高空前地仰仗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宏观经济不稳定及其造成的中小企业反复遭遇政策压抑，必然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结果反而伤害经济增长速度。

其次是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导致对比较优势的背离。人为推动的大规模投资意味着过多廉价资本的投入，压低了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导致背离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并加剧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在2000年以后呈迅速上升的趋势，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经过2003年和2004年的快速攀升，资本密集化的绝对水平已经高于沿海地区。例如，2007年，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化程度更高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显示，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即人口红利的式微，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进一步弱化，经济增长越来越具有新古典特征，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已经遇到报酬递减现象，具体表现为随资本投入增长加快，资本边际回报率迅速降低（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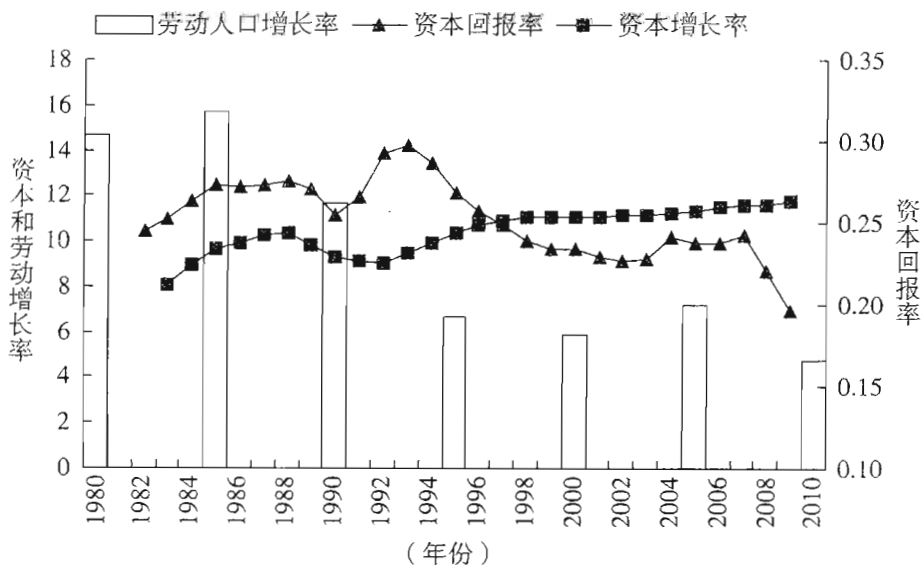


图4 资本深化与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资料来源：Cai和Zhao (2012)。

第三是造成资源的浪费，加重已经呈现的产能过剩。外在于市场力量的投资行为，容易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当，投资效率降低，进而造成产能过剩的结果。政府在选择优势变化加快的时期，介入直接的投资活动，以寻找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部门、地区等新增长点，在赶超型国家是一个常见现象。正如在中国可以看到的，这类政府干预可以体现在一系列政府战略和政策之中。总体来说，被选择为接续传统比较优势，政府意在扶持的新兴产业，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技术上具有探索性等特点。一旦确定，其投资和建设可能产生蜂拥而上的后果。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进程中，经常会把作为发展结果的产业结构当作直接赶超的对象，即企业在预测动态比较优势时，往往把发展特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业作为赶超手段。在众多企业和投资者的判断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在投资的方向上就会形成潮涌现象（林毅夫，2007）。在政府介入投资活动的情况下，不仅政府及其引导的投资规模较大，而且附着着各种优惠甚至补贴，更是以其引导性和产业关联放大这种投资影响，引领投资涌向同一方向或同一地区。

多年来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尝试解决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与基础设施先行、区域发展战略、产业振兴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政策的实施之间，有着内在的矛盾。产业政策或区域发展战略中选定的产业名录，往往成为超前发展的行业，也恰恰是潮涌现象发生，进而形成过剩产能的领域。例如，2010年，相对于而言，除了纺织业和轻工业中的部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之外，那些被列入扶持对象的行业，产能利用率大多显著低于中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82%的水平。其中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还不到50%，有色金属行业只有70%略强（曲玥，2012）。

最后是造成对无效率企业的过度保护，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经营不善从而应该退出的企业甚至行业干预补贴等各种优惠，直至政府进行直接干预防止其倒闭，总是以保就业、GDP和税收的名义做出的，但其结果则是保护落后，伤害竞争机制，造就僵尸企业。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握有后发优势，在体制改革、管理效率提高、新技术应用等诸多领域中，仍有大量低垂的果子可供收获，以显著改善微观生产效率。要获得这个效率源泉以便保持持续增长，有赖于企业的各种创新行为，做出适合自身效率最大化的管理模式和技术的选择，而政府在其中任何一项微观经济活动中，都不宜越俎代庖。

中国古代哲学所讲“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与熊彼特认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即如果没有一个创造性破坏的环境让缺乏效率的企业消亡，让有效率的企业生存和发展，就无法使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微观生产效率在经济增长中起支配作用，在更接近新古典增长的环境下，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四、挖掘新的增长源泉

综上所述，在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并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人为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高速度，是不恰当的政策选择，在许多情形下会伤害长期可持续性，造成欲速不达的结果。因此，对于经济政策决定者来说，认识到潜在增长率的约束性是必要的。然而，潜在增长率却是可以改变的。通过挖掘相关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以及提高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允许经济增长实现更高的速度。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诸多机会窗口，可以通过改革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

目前，人们作出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预测，主要基于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不仅劳动力供给本身制约经济增长速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短缺意味着长期以来资本报酬不会递减的经济增长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如果劳动力供给潜力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同时人力资本得到显著提升，不仅有助于消除要素瓶颈，还有利于缓解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古典增长特征，长期可持续增长，归根结底需要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变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来。因此，探索如何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途径。

首先，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潜力仍然巨大。一般来说，在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之后，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陆旸，2012）。对于中国未来5~10年的时间来说，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稳定其劳动力供给，是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中国特色道路。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9.95%，但是，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口比重仅为34.17%。两个比例之间的差别主要是那些进入城市务工经商超过6个月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农民工身在东部城市打工，而户籍仍落在中西部农村这种状况，意味着按

照现行户籍制度，他们不能长期稳定地在打工地区生活及至养老。因此，通常在年纪偏大之后就会返乡务农，导致务农劳动力或者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由40岁以上农民构成。

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却未能获得城市户口的状况，不仅降低了城市公共服务的均等水平，也导致这部分重要劳动力来源的供给不稳定。因此，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主要内容的户籍制度改革，并配合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可以消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扩大其进一步转移的地理和产业空间，加大劳动力供给总量。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力度要明显加大。根据中国数据估算，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1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间仅仅从6.24年增加到7.56年，总共才增加1.32年，2005年为7.88年，5年中只增加了0.32年。

为了达到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要求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保持高速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普及义务教育达到的。随着义务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的水平，继续提高受教育年限必须通过高中和大学的普及。高中与大学的入学率互相促进、互为因果。高中普及率高，有愿望上大学的人群规模就大；升入大学的机会多，也对上高中构成较大的激励。目前政府预算内经费支出比重，在高中阶段较低，家庭支出负担过重，加上机会成本高和考大学成功率低的因素，使得这个教育阶段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瓶颈。因此，从继续快速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着眼，政府应该尽快推动高中阶段免费教育。相对而言，高等教育应该进一步发挥社会办学和家庭投入的积极性。

最后，开拓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新领域。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由于农业中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农业生产率显著低于非农产业，因此，劳动力转移本身就可以带来巨大的生产率改进。在中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增长中，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条件下，随着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必然减速，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途径也将发生变化。

具体来说,如图5所显示,随着中国经济日益从二元经济发展向新古典增长转变,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将经历从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到第二和第三产业内部重新配置,及至到部门内企业间的重新配置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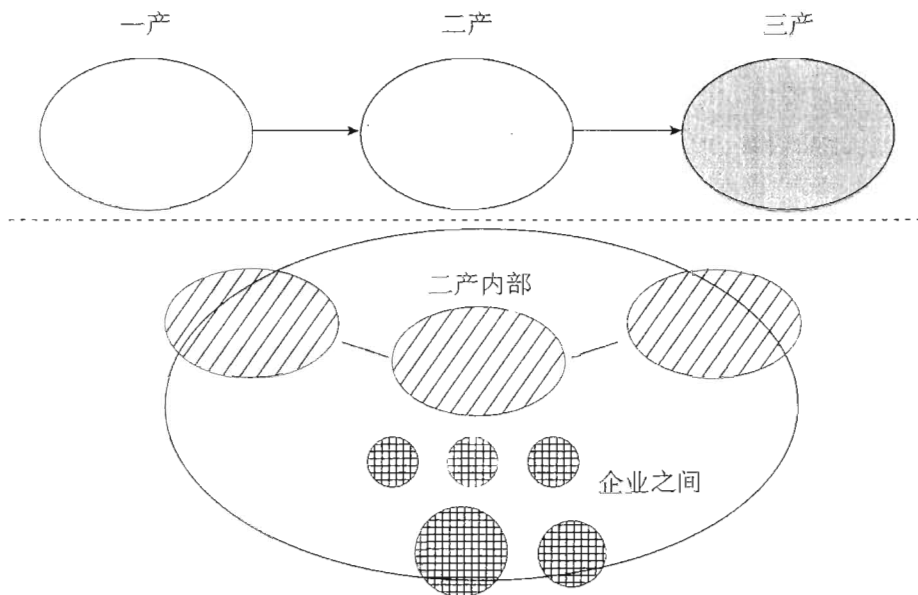


图5 刘易斯转折点前后的生产率源泉

未来10年,是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与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汇总2007年世界上一些处于这个阶段国家的资料可以发现,平均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4.8%,比中国低接近10个百分点^①。这意味着今后10年中,我们从现有的1.92亿农业劳动力出发,每年需要减少近200万人,即降低1个百分点。这样的话,就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进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不过,随着新古典增长时期的来临,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式微。今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于以下源泉。第一,由于第二产业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流动,可以

^① 突破以往只能对劳动力就业按照年度进行分类的局限,把农村劳动力在不同经济活动中的劳动投入,以人月进行了划分得出,可以发现中国目前实际务农劳动力总数为1.92亿,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为24.7% (都阳、王美艳,2011)。

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第二，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生产率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地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进而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从这些源泉实现更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求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五、结语

在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条件下，借助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以追求一个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 GDP 增长速度，既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政策手段，又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特质，容易被决策者接受，实施起来也比较直截了当。而改变潜在增长率的办法，大多有赖于在诸多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低垂的果子”已经被采摘殆尽的条件下，进一步改革难度加大，常令人举步维艰。

以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著称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卡拉斯指出，诸如发展资本市场、加快创新和发展高等教育、改善城市管理、建设宜居的城市和形成集聚效应、有效的法治、分权和反腐败等领域的改革效果，至少需要 10 年之久才能显现出来（霍米·卡拉斯，2011，第 470 ~ 501 页）。着眼于提高未来潜在增长率的改革所具有的这种长期性，常常会使决策者因耐心不足，而回到超越潜在增长率的老路上。但是，走老路的结果最终必然是伤害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

可见，深化改革固然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却不应该过于功利地看待改革，期待对于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面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需要把改革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为更长期的持续增长构建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习惯于并接受在更接近新古典增长状态下的较低增长速度，把增长模式从立足于各种“低垂的果子”的速度型，转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

参考文献

Amornthum, Somchai (2002), Japan's Potential Growth: An HP Filter Approach, *Research Paper for Econ 614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Bai, Moo - ki (1982),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Korean Economy, *Developing Economies*, No. 2, pp. 117 - 140.

Cai Fang and Zhao Wen (2012), 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 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 in Masahiko Aoki and Jinglian Wu (eds) *The Chinese Economy: A New Trans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forthcoming.

Kuijs, Louis (2009), China Through 2020 - A Macroeconomic Scenario, *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9.

Minami, Ryoshin (1968),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2, No. 3, pp. 380 - 402.

都阳、王美艳 (2011), 《中国的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 重新估计与讨论》, 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12——“十二五”时期挑战: 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霍米·卡拉斯 (2011), 《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应之道》, 载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编著《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 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 中信出版社, 第 470 ~ 501 页。

林毅夫 (2007), 《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 《经济研究》第 1 期。

陆旸 (2012), 《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及其预测》, 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13——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再平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穆光宗 (2012), 《“负人口观”阻碍大国复兴》, 《环球时报》7 月 21 日。

曲玥 (2012), 《大规模投资维持的增长速度——产能过剩研究》, 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13——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再平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12), 《中国发展报告 2011/12: 实现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发展出版社。